



国学网 >> 正文

打印本页

搜索

搜索

文体形态：有意味的形式

作者：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广东广州510275） [2001-6-4 20:37:58]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形式众多的文体形态。文体形态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可以这么说，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体形式的演变史。

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史是有一定独立性的研究领域。文体史研究在价值取向以及理论、方法等方面，不仅应该有别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应该与一般文学史研究有所区别。比如，文体史的分期不仅与政治史分期不同，与文学史的分期既应该有所联系也有所区别，因为文体史发展和文学史发展各有不尽相同的规律。虽然文体史与文学史研究都离不开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但是文体史研究的重点却在把握各种文体形态总体的规范及其发展演变。文体史与文学史的视角有所不同，其价值判断也有所不同，有些作品在艺术方面水平并不高，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但也许在文体形态方面有独到之处，在文体史上就有独特的地位。同样，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品，未必在文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本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而在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往往未能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因为从现在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因此，我们的古代文体史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应。

文体形态是作品的语言存在体，它是文本存在的基本要素。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忽视对于文体形态的研究，原因就是往往把文体形态看成只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其实文体形态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文本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特殊关系，从而构成了某一体裁的独特的审美规范。文体形态具有深广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内涵，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的语言规则。文学的体裁及其体式规范是人类在长期文学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它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往往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期间，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或者有综合集成之功，但是从根本上讲，文体形态的形成及演变是集体长期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文体规范是一种带有共性的语言规则。

社会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文体发展的两大动力，这是研究文体发展史的线索。文体形态不是纯语言现象，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精神需求才是文体形态创造和发展的内在的原因。因此，文体语言形式的深层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文体发展与人类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有关系。人类在与自然及社会长期交往的历史中，形成艺术地感受和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和精神结构，而这些又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文体史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历史。文体具有特定的文化上的指向，文体指向一般说来与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同一的。文体产生与演变也同样指向时代的审美选择与社会心态，所以文体史研

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也是共通的。

下面举六朝的忏悔文为例。中国本土文化宗教色彩淡薄，其自身的传统是“反省”而无忏悔，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中国传统的反省，强调人主观的内在超越，而绝非向至高无上的神忏悔。中国人缺乏忏悔的传统，在中国文学中几乎看不到表现忏悔意识一类的文学作品。所以六朝所出现的“忏悔文”这一文体就非常值得注意了。中国人的忏悔观念，是在佛教传进中国之后才产生的。忏悔是佛教徒常用的行为，为了减轻或消除罪业而于佛、僧之前自述所犯身、口、意等三业之忏悔仪式。《法苑珠林》卷一百三《忏悔篇》：“积罪尤多，今既觉悟，竭诚忏悔。”有忏悔之举，遂有忏悔文文体的出现。所谓忏悔文，就是自陈改悔之文。萧子良《净住子净行法门》“开物归信门”极言忏悔的重要性，忏悔的内容，是非常广泛，有“忏身”、“忏口”、“忏意”，其内容“从无始世界已来，至于此生”。《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下，悔罪篇第九收入忏文16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沈约的《忏悔文》：

弟子沈约稽首上白诸佛众圣：约自今生已前，至于无始，罪业参差，固非词象所筭。

识昧往缘，莫由证举。爰始成童，有心嗜欲，不识慈悲，莫辨罪报。以为毛群鲛品，事允庖厨，无对之缘，非恻隐所及。晨剉暮爨，亘月随年。嗛腹填虚，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灵靡达。遨游之间，恣行天暴。蠢动飞沈，罔非登俎。悦想逢值，横加剿扑。郤数追念，种汇实蕃。远忆想间，难或详尽。

又暑月寝卧，蚊虻嚼肤。忿之于心，应之于手。岁所殀殒，略盈万计。手因怒运，命因手倾。为杀之道，事无不足，迄至于今，犹未顿免。

又尝竭水而渔，躬事网罟。牵驱士卒，欢娱赏会。若斯等辈，众伙非一。党隶宾游，愆管交互。

或盗人园实，或偷人刍豢。弱性蒙心，随喜赞悦。受分吞脏，皎然不昧。

性爱坟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将二百。又绮语者众，源条繁广。假妄之愆，虽免大过。微触细犯，亦难备陈。

又追寻少年，血气方壮。习累所缠，事难排豁。淇水上宫，诚无云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此实生死牢穿，未易洗拔。灌志惨舒，性所同禀。迁怒过嗔，有时或然。厉色严声，无日可免。

又言谿行止，曾不寻研。触过斯发，动沦无纪。终朝纷扰，薄暮不休。来果昏顽。将由此作。前念甫谢，后念复兴。尺波不息，寸阴骤往。愧悔攒心，罔知云厝。

今于十方三世诸佛前，见在众僧大众前，誓心剋己，迫自悔责。收逊前愆，洗濯今虑。校身诸失，归命天尊。又寻七尺所本，八微是构。析而离之，莫知其主。虽造业者身，身随念灭。而念念相生，离续无已。往所行恶，造既由心。行恶之时，其心既染。既染之心，虽与念灭，往之所染，既成后缘。若不本诸真谛，以空灭有，则染心之累，不卒可磨。

今者兴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无所托。布发顶礼，幽显证成。此念一成，相续不断。日磨岁莹，生生不休。迄至道场，无复退转。又彼恶加我，皆由我昔加人。若不灭此重缘，则来恶弥遘。当今断绝，永息来缘。道无不在，有来斯应。庶达今诚，要之咸达。（《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下）

我们的文学史家，甚少注意到此种忏悔文。其实在此忏悔文中，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所从未出现过的忏悔意识，从未出现如此全面、真率到大胆的自我剖析。如说自己“追寻少年，血气方壮。习累所缠，事难排豁。淇水上宫，诚无云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将自己的隐私都说出来了，这在儒家传统来看，这种表白是不可思议的。不过，综观六朝的忏悔文，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忏悔，大致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即为了禳灾求福，而不是出于内心道德自我完善的需求。多数忏悔文大致是程式化的，所忏悔的罪过也是人人相同，还是很少真正将内心见不得人的东西暴露出来。从六朝的忏悔文，可以研究出中国人忏悔意识的

出现，也可以看出忏悔意识在中国由于受到强烈的实用目的之影响，从而限制了忏悔意识的深广发展。总之，从六朝的忏悔文上，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某一方面内容，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人们常常忽视一个事实：文体史的研究也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关系密切，从文体兴衰往往反映出时代的文学风尚。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喜欢将某种文体作为某一时代的代表，有所谓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这些说法往往容易失之简单化，事实上，同一时代某一文体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其他文体必然的衰落。不过，特定的文体在特定的时代发展到登峰造极却是不争的文学史实。在同一个时代中，也不是所有的文体都是均衡发展、地位相当，总有主导性的文体。人类的感官知觉的方式随着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感受方式和审美心理结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体其实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时代和群体选择了一种文体，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工具，这正是文体兴盛的基础。

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坛兴起一些创作形态，如唱和、赠答、联句、同题而作、分题分韵、公宴诗、即席创作、奉和等，这些创作形态往往又是交织而兼用的。当然，有些创作形态早在魏晋以前就出现了，但是直至魏晋南北朝才形成风行的局面，而且从总体上呈现一种当时诗坛上带共性的审美趣味：它们都体现出诗歌创作上注重集体性与功利性交际功能的倾向。通常人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倾向是注重个性化与审美，其实这仅仅只是一方面而已，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注重集体性与实用性的交际功能的观念，也是不可忽视、不可回避的。由此看来，魏晋南北朝文坛与儒学传统之关系，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论题。固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创作，对强调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儒学文艺观有所突破，但在深层方面，仍然受到儒学的巨大影响，甚至对儒家文艺观有所发挥，比如他们在创作形态上，比起前代都更充分地体现了和发挥儒家“诗可以群”的美学观念。儒学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虽然不及汉代，但是儒学的一些内在精神在人们的观念中仍处于统治地位。尽管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没有直接阐发儒学“诗可以群”的诗学思想，但是在创作上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实践和发展着这种思想。魏晋以后，文人在社会生活中交往更为广泛而频繁，社会交际变得越来越重要，诗歌创作在注重个人“吟咏情性”的抒情功能的同时，其集体性与功利性的交际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上述所涉及的种种文学形态正反映了这种文学倾向与文学观念。

从魏晋南北朝文体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当时的文坛思想观念的了解就更为全面了。在魏晋南北朝，由于文学观念的自觉，诗歌创作的地位提高了，诗歌既成为抒发个人性灵的工具，也开始成为公共社会关系的润滑剂。魏晋南北朝文人对于这种创作的集体性与功利性交际功能的追求已形成一种风气，诗人一方面固然可以利用这些形态，表达出对于亲情、友亲、同僚之情以及君臣之情，同时诗坛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歌功颂德、附庸风雅的低劣诗篇，产生出大量遵命而作、为情造文的无聊作品。自此之后，诗歌既可能成为雅品，也可能沦为俗物。

作者：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广东广州510275） [2001-6-4 20:37:58]

本条消息被浏览了 [2378] 回



把本页介绍给你的朋友

◎上篇信息：[四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外国佛教研究综述](#)

◎下篇信息：[文体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关闭窗口】](#)

